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

黑格回忆录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时事出版社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六)

黑格回忆录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时事出版社

1985年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六)
黑格回忆录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昊海公司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5 字数: 113,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统一书号: 3225·026 社科新书目: 127—122
定价: 0.80元

GDB 21

编者的话

里根政府的第一任国务卿、也是美国的第五十九届国务卿小亚历山大·黑格的回忆录《慎思谨行：现实主义、里根和外交政策》，一九八四年四月由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它正式出版以前，美、英、法、联邦德国等国一些有影响的报刊都摘要刊载或加以评论，表示出相当的重视。这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对外政策方面的矛盾与冲突。自从一九四七年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在他的回忆录《直言无忌》中攻击了杜鲁门的对外政策以来，还没有一位高级内阁官员对现任政府发表过这样的抨击。

黑格在这本回忆录里谈到了里根政府第一任期间外交上遇到的许多重要问题。如美苏关系、美中关系、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波兰事件、黎巴嫩问题等，他还用了不少篇幅谈到他自己是如何应里根总统之邀担任国务卿、后来又是怎样愤而去职的。黑格与里根在外交政策上并无实质性分歧，他被迫下台主要是与总统的幕僚们严重不和。

本书第十章专谈对华关系。从时间上说，正与本译丛第二集《美中建交前后》相衔接。这一章记叙了里根上台至一九八二年六月这段时间内美中关系的发展，从中可以看到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

原书约合中文二十五万字，有些地方作者议论较多，有些内容对于我国读者来说关系不大，且头绪也比较纷繁，为节省读者的时间与精力起见，我们从原书节译约十万字，节译时既参照西方报刊对该书加以摘要时的取舍标准，也考虑到我国读者的情

况，将有的章节全部删去，有的章节略加删节，有的章节基本上全部移译，如专写中国的第十章就是这样处理的。

本书除第六、十、十四章由张小川翻译外，其余均由郑须弥翻译。限于水平，我们的选材不一定妥当，翻译上也难免有失误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教正。

编 者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第一章	“担任我的国务卿”	(1)
第二章	“到处一片捉摸不定的气氛”	(15)
第三章	“谁都不能垄断美德”	(20)
第四章	“一批强有力的专业人员”	(25)
第五章	“艾尔，这不过是报上的小道消息”	(33)
第六章	“给莫斯科的信号”	(49)
第七章	中美洲 (略)	
第八章	“至于说到现在，这里是我在控制全局”	(71)
第九章	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 (略)	
第十章	中国：“为什么总是有这种令人惊讶的事？”	(86)
第十一章	核武器 (略)	
第十二章	波兰：“现状不能持久”	(109)
第十三章	福克兰群岛：“不要力劝英国奖励侵略”	(116)
第十四章	“总统先生，我希望你明白在你周围 发生了什么事情”	(123)
第十五章	黎巴嫩 (略)	
结 论		(133)

第一章

“担任我的国务卿”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一日，当选总统罗纳德·里根请我担任他的国务卿时，我跟他单独相处的时间还没超过三小时。其中的一小时左右是在一架海军陆战队的直升飞机上度过的，其时我陪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州长里根从白宫飞往戴维营，又飞回来。那一年是一九七三年，里根到白宫是要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交换意见，其时，尼克松由于水门事件而遭到严厉攻击，正在寻求杰出的共和党人的支持。在直升飞机上我们没有说什么话，因为那既不是说话的时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

一九七九年春天，里根和我再度会面，那是在他的加利福尼亚家中。那一次，我们主要谈论埃德加·伯根。这位著名的口技演员业已去世，里根刚参加了他的葬礼回来。里根的乐天精神因为这次丧事的悲感而沉寂下来。伯根和里根是多年的朋友；在葬礼上诀别显然使他心中难过。里根感到疲倦。他的脸拉长了；思想还停留在他朋友身上；衬衫袖口上还留有一小块化妆油彩的污渍，显出悲哀的气氛，这是当今电视时代政治家的特征。里根客气地迎接了我，在充满深情地讲了一两件有关伯根的事情并草草喝完鸡尾酒之后，便请我进入餐室。

这次晚间会面是由其他来宾之一理查德·艾伦安排的，我早已知道他是亨利·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班子中不稳定的一员。我当时仍是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但我已经宣布有意辞去这个职务并在几周后从军队退役。在欧洲时，我曾就美国对苏政策作过若干声明，新闻界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总司令吉米·卡特总统

的政策所表示的不满。因此，艾伦打电话给我说，下次我回美国时里根愿意听听我对欧洲局势的估价。就在这天晚上，我从圣路易乘坐商用飞机到洛杉矶高地里根的并不铺张的家中吃晚饭；我是为了北约的事务去圣路易的。

里根夫人自然是美国最有魅力的女主人之一。初次见面时，她给人的印象是谨慎的腼腆，随后有时也是这样，但她具有一种生气勃勃的智慧，谈话时能随机应变，且对她丈夫的情绪有准确无误的感受。这是个小型的晚餐会。除了理查德·艾伦之外，其他来宾有我的助手塞思·赫金斯少校及彼得·汉纳福德，他是米切尔·迪弗在华盛顿的一家公共关系公司中的合伙人，又是台湾院外集团的主将。上文已经说过，里根因老朋友逝世而感到心烦意乱。他显然感到疲乏。里根夫人殷勤周到，甚至焦急，并尽量要把当天晚上她丈夫肩上的担子减轻，以便让他舒服一些。在这一点上她得到汉纳福德的帮助，其方式虽然羞怯踌躇，但却有效。助手们保护他们为之工作的要人，使之不受外人的纠缠，这是常有的事。对里根的照拂则超过了常情：连显然是对里根提出的问题也由别人代答。这样做的结果，里根在那天晚餐席上相当缄默。尽管我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还是得承认我对他情绪不好感到失望。

我对里根在国内外政策上任何一类问题的观点都极感兴趣。我去参加晚餐会是准备要提问问题的。但我却发现自己是在回答问题。里根夫人巧妙地引导着席上的谈话。我发现她对时事有一种明确而敏感的看法。我们谈到北约，谈到盟国的国内情况，谈到苏联的军力增长。迪克·艾伦时不时地插进来发表意见。艾伦是个想当而没当上喜剧演员的人，说话时总有一种高高兴兴的基调，他的话使当时的阴郁气氛变得明快起来，里根本人殷勤好客，听到笑话就微笑，偶尔说句把话，以不胜钦佩与喜爱的眼神注视他的夫人。

那天晚上过得很愉快，南希·里根在饭桌上的谈话很有吸引力。晚餐会结束后，我驱车回到飞机场，途中我醒悟到我与这位可能——我当时已经猜到了——要当上美国第四十届总统的人几乎还没有谈上一句话，不禁有几分吃惊。我希望还会有一次机会，但我了解总统级人物的作风——还有为有权势人物和可能有权势人物把门的幕僚助手们的作风——我想我和里根可能不会再见面了。

几个月过去了。六月底，我离开北约，结束了我三十年的军旅生涯。我的妻子帕特和我在费城郊区的一所公寓里安了家，在三十多年作客异乡之后再回到故乡来实在是种享受。这种生活很愉快。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主持了关于总统职权的讨论会，并担任了“对外政策研究所”和几家公司的理事。我还在企业界和专业人员的听众面前作了一系列讲演，以此作为手段表达了我作为一名现役军官只能隐忍下来的对防务和外交政策的某些强烈看法。这种活动使我的足迹遍历约四十个州。我从事这种旅行的主要目的，除了直抒胸臆这种快感之外，便是赡养家庭。在他人看来，这仍旧象是要竞选提名；在华盛顿还组成了一个“黑格竞选总统委员会”。尽管有关人士并未同我商量，我却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干涉他们根据宪法支持任何人竞选总统的权利。但我从未想象过我会有获得提名的机会。

八月，我又接到理查德·艾伦的电话。里根想和我再次谈话。我能到牧场去吗？我说行。但我希望这次能有机会提出我的问题并且回答里根可能问的任何问题，我还问他和我是否能单独会见，因为我想这样做会节省里根的时间。我的要求得到了同意，我就到加利福尼亚州去了。

在圣巴巴拉以北的里根夫妇的牧场上，有一种居家的朴素气氛，使人感到悠闲平静。从牧场向外看是太平洋，眼光收回来便落在群山之中，干旱的景色显得柔和宁静。在陡峭的山腰公路上

弯弯曲曲地向上行驶了一段路程之后，我便到达了目的地，里根夫妇在门口迎接我。然后他们领我在整个地产上参观了一周。一种边远地区的节俭气氛给我印象很深。罗纳德·里根和南希·里根用他们的双手建设了这个地方，或者说这个地方的大部分。他们在栅栏周围树起了坚固的圆木篱笆。他们一起重建了牧场小平房，这所小平房在他们买进时已经快要倒塌了。他们对自己完成的工作极其自豪，这种自豪感还很有感染力。你感到这片牧场不仅是处休养所，而且是里根夫妇呆得最惬意的地方。

参观完毕，里根夫人和我有力地握手告别。她显然心情良好，对我解释说她要去骑马——“这样你们两人就可以单独谈话了。”我猜想我私下会见她丈夫的要求引起了误解，但没有机会来弥补这次冒犯了。里根夫人上了马，慢跑而去。

里根身穿紧身斜纹马裤，脚蹬一双旧式带扣马靴，一付身体健康、乐意与人交往的样子。我们在牧场小屋的起居室里坐定谈话，四壁都是印第安人的手工制品和西方的艺术制品。里根似乎真心高兴看见我。我见到他当然很高兴。我对他一直怀有亲切的感情，这要回溯到尼克松政府时代，当时他和我有一段电话上的交往。我有时必须打电话给主要的州长和其他人，要求他们支持总统的某些政策或行动，这是我的职责的一部分。这些电话几乎都是要争论不休的。要一个人在对他政治上没有好处、甚至会有坏处的问题上出头露面，这通常不是什么好差使。但罗纳德·里根是位忠臣——我这是就这个词的最好意义说的——是位似乎本能地把国家放在政党之上、政党放在他个人之上的人。尼克松总统要他支持的时候，他就给予这种支持。他作为加州州长，有时要为这种支持付出可观的政治代价，但在提供支持时他总是毫不吝惜。

我想，邀请我来这里是因为罗纳德·里根和我有若干共同之处。人们认为我们两人都会被共和党提名为美国总统候选人。当

然，里根正开始以竞争领先者的姿态出现。我没有打算当总统，我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多次重申这一想法。但在美国生活中，在从事社会活动的人所讲的真话中，这种话是人们最不可能相信的，所以，里根或至少是他周围的人对我的真实意图不作判断，我对此并不特别惊讶。

谈话进行得很顺利。里根和蔼可亲，说话平易明白，既不作隐喻，也不讲行话，尤其是他总给谈话对方留下他对他有好感的印象，这些都造成良好气氛。简单地说，罗纳德·里根是个好人，而且人们时刻都知道这一点。有幸具有这种天赋的人真是走运。我们象在一起度过星期天下午的老朋友一样，谈到了人质问题，当时这些人质被与霍梅尼有联系的“革命青年”扣押在美国驻德黑兰的大使馆里，还谈到伊朗—美国关系的困难未来。我们谈到被迫流亡的伊朗国王以及这件事对象萨达特这样的人意味着什么。我们谈到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谈到美国历史上这带有悲剧性的两章如何使美国渐渐失去自信。我们谈到增强防务的必要，我们谈到经济以及通货膨胀率的吓人增长。在多数问题上我们意见一致。

唯独在征兵问题上我们看法不同。里根作为保守主义者，认为义务兵役制侵犯了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为了促使他改变这种教条主义的看法，我说美国青年在成长过程中应该对国家有一种义务感。在我看来，在对所有阶级、各种身份的公民都绝对公平的情况下为国服役，对恢复全国一致感和目标感、对打破二次大战以来就在美国青年中出现并与美国观念互相排斥的关于社会阶级的人为看法等方面都会起很大作用。我在朝鲜时是一名年轻的军官，那时，我对出于教育方面和主要有利于白人中产阶级的理由而同意缓役的政策有反感。征兵制度公开打算要优待富人和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其结果只能是使一般士兵中既无富人也无受过高深教育的人。我从跟他们一起作战的经验中知道，这些年育人

是勇敢、聪明、顽强的士兵。然而他们极少是医生、律师、公司总经理和政治家的儿子。如果美国步兵师中这种人多一些，死去的士兵就会少一些；他们家庭的影响会使美国政府以相当不同的方式打这两场没有决定性结果的战争——或者会奉行本来不会以诉诸武力来维持美国立场的政策。

里根不能接受我的劝告而使他反对征兵的立场有所缓和。但是，在九十分钟的共处以后，我们发现两人都能够接受对方大部分的想法和说法。于是里根问我是否愿意支持他——用他的话说是“加入我的班子”。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在要求我放弃我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资格。这本身是不成问题的。我不能设想我会对里根的提名形成任何威胁。但我还没有准备好要向某位君主宣誓效忠。我想暂时还是一切照旧比较好：用我自己的话对我自己的听众在我感兴趣的问题上发言，不必顾虑我会说出什么可能被解释为与里根的某些立场有冲突的话。

我告诉罗纳德·里根，暂时我还不能成为他政治家庭中的一员。但我向他保证：我在全国各地演讲时，他可以指望我不做任何会使我们两人对立的事。除了征兵问题以外，我会支持他的基本政策的。

人们还在猜测我自己有当总统的野心。在一个倡导表达意见绝对自由的国家，是没法阻止这种猜测的，但我尽力不做使形势恶化的举动。我正在找工作；关于我渴望进入椭圆形办公室的谣言是不会使可能雇佣我的人放心的。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与费城和华盛顿特区曾代表我进行工作的人讨论了这项决定以后，我向新闻界正式宣布我不是总统候选人；我希望这一来就可以使这件事告一结束。十二月二十六日，我被提名为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联合技术公司”的总裁和主要管理人员。帕特和我搬到这个美丽的新英格兰社区，住进一所我们希望在其中终老的舒服房子，面对着领导一个大公司的挑战，我们都有一种充

满希望从头开始的感觉。

有一片过路的乌云。打网球的时候我感到腿痛。与实行人寿保险有关的就职前的健康检查表明，我的冠状动脉有梗塞现象。这使我惊讶。我除了朝鲜战争时期得过传染性肝炎之外，一生从未生过病。我从军界退役时的体格检查还没有任何可疑的迹象。一九八〇年三月底，在休斯敦的圣卢克主教派医院的得克萨斯心脏研究所，以丹顿·库利博士为首的外科小组为我作了心脏搭桥手术。一个月之后，五十五岁的我便和以前任何时候一样的活跃和健康。

一九八〇年七月，我接到里根班子成员之一的迈克·柯布打来的电话。柯布说，州长（里根原任加州州长——译注）希望我能出席共和党在底特律召开的大会，并就外交政策发表讲话。

我的讲话以共和党党纲的对外政策要点为基础。也以我在全国各地所作演讲的部分内容为基础。这篇讲话要求有一个相当类似我日后在里根政府内部商议中所提倡的计划。我讲话后，里根的非正式顾问团成员、又是老朋友的贾斯廷·达特和我握手说：“你是我们的下一任国务卿。”在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以后，我听到这句话一点也不惊讶——共和党大会上充满了夸张的气氛——但我并没拿这句话当真。在我回到哈特福德和我的工作岗位以前，我只有一次再遇见里根，其时我们在底特律波兰裔美国人集团宴请的午餐上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尽管我知道我是应里根之请来到这里的，但这种场合只适宜互相寒暄一番。

里根当选之后，理查德·艾伦打电话给我。艾伦即将出任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一九六九年在尼克松手下时他也盼望出任此职，却被一个更一本正经的人亨利·基辛格打败了。艾伦代表里根说话，说我是内阁职位的候选人。首先提到的职位是国防部长。我指出军人退役后十年内不得出任国防部长。陆军上将乔治·马歇尔是唯一被提名为国防部长的军人，但要做到这一

点，必须有国会的一项特别法案。在我看来，马歇尔将军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适于成为这条规定的例外情况的，而且应该是唯一的例外。

在当选与就职典礼之间，艾伦代表当选总统邀请我去华盛顿的麦迪逊饭店出席欢迎牙买加总理爱德华·西加的宴会。宴会之前，我被请进这家饭店的一间小房间，去会见里根的助手埃德温·米斯第三、詹姆斯·贝克第三以及当选总统的朋友和顾问、内华达州参议员保罗·拉克索尔特。看来他们到那里是为了好好打量我一番。闲谈很少。他们先问我：是否有什么与水门事件有关的事需要隐瞒。我保证什么也没有。然后，米斯问我第二个问题：我想当总统吗？我作了否定的回答。这似乎是个奇怪的问题。米斯自己的老朋友、一位共和党人，刚刚以压倒优势当选。显然任何其他共和党人都构不成对他的任何政治威胁。稍后，在席上，米斯探身对我妻子说道：“别担心，他会成功的。”帕特把这项不可思议的消息告诉我时评论说：“我担心的恰恰是你会成功。”

威廉·西蒙在里根阵营内部有良好的消息来源，他本人也是内阁职位的候选人，他告诉我说，我将被提名为国务卿。乔治·舒尔茨非常有资格担任国务卿，当时仍被视为主要的竞争者。他在加利福尼亚州比奇特尔公司的同事卡斯珀·温伯格和舒尔茨一样与里根有个人交情，也曾被人提到。最后，舒尔茨仍旧是平民，富有行政经验、曾任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的温伯格则当上了国防部长。稍后我获悉从来没有人要舒尔茨接受新闻界为此提到过他的那个职位。就我自己的可能性而言，电话和传言依旧不断。有一天，电话里传来了我所熟习的理查德·尼克松的男中音，说里根已经决定请我当他的国务卿，这时我开始认真考虑与我有关的传闻了。尼克松凡谈到共和党的事务时，通常是知情的。

那是在十二月十一日星期四，一个冬天的下午，我在办公室里患了感冒，并且正在转为流感。当选总统申明自己是“罗纳德·里根”，并和蔼地说道：“艾尔，我打电话给你是希望你加入我的班子，担任我的国务卿。”

他不停顿地又说下去，他说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艾伦，将只起协调整个班子的作用。里根说：“你是知道我对国务卿这个职位的看法的。国务卿将是唯一的发言人。我不愿让基辛格—罗杰斯的局面重新出现。我仰仗你了，艾尔。”

在牧场时，里根和我曾讨论过那种不愉快局面的发展：尼克松的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是支持他最久的人之一，在政府、在新闻界、从而也在外国都斗不过基辛格，最后，罗杰斯几乎完全被排除于制定对外政策之外，因此只好走路。尼克松不喜欢在任何情形下有令人不快的对峙，而且肯定不希望把他半生以来喜欢并尊重的人解职，因此叫我去把这件事告诉罗杰斯。

这番经验，加上其他人的几乎同样创巨痛深的经验，还有我从历史上得来的了解，使我深信：在总统领导之下，政府中只能有一位官员负责拟订对外政策并加以公开阐明。这位官员可以是国务卿，也可以是国家安全顾问；就这件事而论，他可以是总统选择的任何人——约翰·肯尼迪通过他的弟弟罗伯特推行大部分对外政策，而罗伯特正好是司法部长；林登·约翰逊则起初主要依靠他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但不管此人是谁，他必须是总统的人，是总统选中的、受总统信任的、每天与总统接触并与总统通气的人。他，而且只有他，必须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在总统不愿自己出面说话时，代表总统说话。

我问里根是否可以有一天时间容我考虑并同我的雇主商量一下。在随后几个小时内，我征求我的妻子和哈里·格雷夫妇的意见。要求帕特放弃她刚学会喜欢的生活是不容易的。哈里·格雷仅在一年以前冒险把他创立的公司托付给在企业界并无经验的一

个人，如今要他解除我的合同义务也不容易。他们两人都告诉我：总司令要求一个美国人帮助时，他必须提供帮助；这也是我长期作为军人反复学习的信条。此外，就我性格的一个方面而论，现在我想要这份工作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经为这个职位经历了三十一年训练。我想我能当好国务卿，重要的是有人去当好国务卿。

我接受了。我若有所失地觉察到：同意当国务卿就等于要回到旧日的生活中去，我知道这种生活充满着困难、误解以及对人对事摆不平（有时是不公正）的判断，我曾在六届总统手下任职。我曾目睹其中的一位极不体面地下台，但我也曾看到包括理查德·尼克松在内的总统们胜利登台。我曾目睹高层人士制造战争，也曾看到战场上进行的战争。这些景象我都不愿重睹了。一个人能尽力防止战争，似乎是件好事。因此我满怀希望地欣然接受了里根向我提供的这个职位。

我在罗纳德·里根身上看到比单纯的专门知识更为重要的素质：正派、乐观、有自我教育能力，对美国和人类怀有普通人那样执着的爱，他还类似艺术家那样善于与人交往。

罗纳德·里根能否成为伟大的总统尚不可知。我象多数美国人一样，深切希望他能。我希望我能帮助他。

背景情况

我接受当选总统里根提议的任命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与我作为国务卿的职责毫无关系，但在某种意义上又与之有各种关系。我在麦迪逊饭店与贝克·米斯和拉克索尔特作了哈定式对话之后不几天，《华盛顿邮报》便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我的文章。这些文章对我在白宫的工作、我与尼克松总统的关系以及他辞职时的处境提出了漫骂攻击性的问题。这家报纸影射甚至指名道姓地说，我作为水门事件的一名罪犯，不公正地逃脱了公开受辱和绞

死的命运，这次被任命为内阁部长，可能是纠正过去失察的良机。

我的妻子和孩子颇感苦恼，我的朋友们大为吃惊，我是怒不可遏，若在早些日子，知名人士的名誉还受到法律保护的时候，我真有可能以诽谤罪控告他们。水门事件的掩盖手法遭到指控时，我已经离开了白宫，当上了陆军的第一副参谋长。水门事件发生后，尼克松把我叫回来当白宫办公厅主任。我与这一悲剧性事件并无联系，只不过试图保持白宫这部机器的运转，并在损害——后来证明是无可弥补的损害——造成以后，试图使总统必不可少的权威继续不受触动。

但我简直无法回避这些虚假的指控。回避这些问题就等于说我害怕调查，认为自己经不起这种调查。我完全知道自己能够经得起这种调查。我以前曾经受了彻底的调查，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没有做过任何非法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隐藏。

所有的总统、所有的政治家（而且不仅是政治家）都希望利用新闻界。他们到华盛顿的时候都决心不受新闻界的过分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上都未能做到。人们在向印第安那州的选举人致意时，很容易想起多数美国人并不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或收看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或者，甚至会想起他们不一定相信在报纸、杂志上读到的、在电视上看到的、在广播里听到的所有东西。一旦竞选得胜，候选人作为官员住进了华盛顿，这种记忆往往就淡忘了。于是，奇妙地混合着远大理想、辛勤工作、毕生野心和盲目虚荣的首都华盛顿就变成了整个宇宙：要是我是这么出名，《华盛顿邮报》都在写我，那么，整个世界必然都在读这篇文章。

政治家们靠新闻界过活（但我们知道，有时却又死在新闻界手里）。新闻界靠政治家为生。这种共生关系位于我们国家生活的中心。这种关系一直存在。这种关系可能在与人类开始说话差